

我国古代蹴鞠衰亡与现代足球兴起:礼治与法治

任振朋¹, 周晓东²

(1.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2. 福建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3)

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研究我国古代蹴鞠起源和消亡的过程,从历史社会环境和蹴鞠自身的特点出发,从中西方“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差异以及两种文化下形成不同治理社会的制度“礼治”和“法治”着手,分析二者对蹴鞠和足球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的“礼治”社会下的伦理纲常,森严等级制度,正统的儒道思想弱化参与蹴鞠比赛目的性,过度追求比赛过程的愉悦性等等一些列因素限制蹴鞠运动的发展,并最终使其走向消亡。相反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民族对抗特性,社会的契约合作的“法治”关系,民主自由的公正平等思想为现代足球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社会土壤,并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今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

关键词:蹴鞠;衰亡;足球;兴起;礼治;法治

中图分类号:G8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16)02-0008-04

The Decline of Chinese Cu-Ju an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Football: Ruled by Rites and Rule of Law

REN Zhen-Peng¹, ZHOU Xiao-dong²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 Fuji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Fuzhou 35000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paper studied on the origin of ancient Chinese Cu-Ju and dissolution process. The existing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wo points: one is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Cu-Ju, the other is from western “farming culture” and “ocean culture” focuses on the formed under different governance system of social of “rule by propriet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pointed out there are two reasons leading to the death of Cu-Ju. On one hand, China’s traditional “rule by propriety” under the social ethics and laws, guarded hierarchy and traditional Confucian proprieties reduced the purpose of participate in the Cu-Ju gam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the process of Cu-Ju game, excessive pursuit of pleasure, and so on a series of factors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Cu-Ju campaign. On the contrary, Western society has its own ethnic confrontation features, social contract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ule of law” and the thought of fair equality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formed a sui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ootball. Because of this, football has been developed rapidly and become the world’s first sports.

Key words: Cu-Ju; decline; football; ris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roprieties; the rule of law

蹴鞠,诞生于中国古老的一种球类游戏,和现代足球有许多相似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足球运动起源于英国,并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国际足联在2004年宣布,古代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充分肯定了我国古代足球(蹴鞠)的历史地位。古代足球(蹴鞠)起源于我国,为什么我国古代足球没有延续下来发展成为现代足球,出现断层?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我国古代的“礼治”

我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社会,区别于西方的君主立宪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方式不同,中国采用了“礼”,西方采用了“法”。所谓“礼治”^[1],通俗上指在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张根据“礼”的原则(君、臣、父、子;

收稿日期:2015-12-23

第一作者简介:任振朋(1988—),男,河南濮阳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体育理论。第二作者简介:周晓东(1959—),男,山东人,研究员。研究方向:大众体育。

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等严格的名分和等级之分)治理国家的一种统治方式。在我国历史上这种“礼治社会”之所以持续几千年,原因在于我国所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东部和南部为海洋、西部为高原和山脉、北部为广阔的大草原,并且有两条自西向东的大河),以及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农耕社会。村庄、城镇、部落的形成依靠种族血缘关系,并且区域人口流动少。已故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单元称为“差序格局”^[2];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而这一圈圈的波纹就是我们的亲属关系。换句话说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以圆心向外画多个同心圆,每一个圆都是以自己血缘、亲缘、地缘建立起来的,圆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君、臣、父、子,贵贱、上下、尊卑、亲疏”决定着圆的大小远近。人与人之间有交集,圆与圆之间有交叉,就构成了“缘”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熟人”的社会。所以根植于农耕社会,血缘、亲缘、地缘的社会关系构成了我国“礼治社会”的基础。

在封建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对于个人的欲望出现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极度地受到压抑(如大多老百姓、“士农工商”等);另一方面又极度地得到膨胀(如皇权、族长权和家长权)。统治阶级长期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差等之爱”“血族宗法”^{[3]93-95}制定三纲五常,压制、限制个人本能的欲望。把个人的欲望关进“礼”的笼子里,束缚人们的生产活动,在伦理纲常面前唯命是从,弱化身体对抗的本能,温顺服从。同时被统治阶级所推崇的传统文化精髓,儒、道、释三种亚文化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古代民族的内向性和收敛性。

2 古希腊的“法治”

“法治”在以奥林匹克文化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与中国封闭的地理、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农耕社会”截然不同,西方社会则是典型的“海洋文化”下产生的城邦社会。以希腊为例,典型的岛国,土地贫瘠,物质贫乏,人口多,为了谋生必须把获取食物的空间扩展到大海。所以近海的居民靠下海捕鱼或是经商为主;远海山区的农民,则逐水而流、逐草而居;平原的居民则和我们一样过着农耕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整体而言,古希腊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多样化决定居民生活的多样化,但不管

是游牧业还是捕鱼、下海经商等所形成的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都存在着竞争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大自然(草原和海洋)。

关于希腊先民生产方式的多样化所形成社会关系,李力研先生直接指出:商贸和航海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快速流动,瓦解着血缘机制,推动着生产关系像契约合作的方向转化^{[3]83}。古希腊社会血缘机制的摧毁,注定其不可能形成中国以血缘关系建立起的等级制度,但它却为产生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平等的的第一要素就是自由,身份平等、参与平等,这显然与中国的“礼”格格不入。古希腊社会的血缘机制被摧毁,增加了靠契约合作维持社会关系的可能。如何用契约合作的形式来稳定社会的稳定,即保障在合理的范围内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欲望,使每个社会成员在身体上自由,在社会上地位平等。于是慢慢制定各种规则来统一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这也就是“法”的雏形。在“法”的面前,是弱者向强者挑战证明自己的欲望诉求,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机会、平台,向强者发起挑战,这在东方文化里是不可能发生的。到这里,我们就不会奇怪,在我国古代经济基础高度发展的社会里为什么没有产生奥运会这么盛大的体育活动,而恰恰奥运会产生于西方一个不显眼的岛国。“竞争”极其简约地揭示了当时的希腊历史已经高度突出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力量,“公平”则是解放人类的自然欲望并设计出的一种适用于一切有机生物生存发展的道德尺度,两者完美的结合的“公平竞争”恰恰是以奥运会为代表的希腊体育运动的历史文化符号^{[3]90}。

3 足球与礼治社会的冲突

古代社会以“礼”为代表的伦理纲常,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束缚着社会各个成员的思想,支配日常生活中的举动。蹴鞠在历史上连绵存在上千年,且每一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即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同。最早记载蹴鞠起源于2300年前的战国,首先流行于民间;汉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方面蹴鞠在民间开展火热,另一方面蹴鞠发挥其对抗、激烈的运动特点,被引用到军事训练;鼎盛的唐宋,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社会长时间的和平稳定,军事训练有所减少,蹴鞠在军队中被用于训练慢慢减少,再者和平稳定的社会给蹴鞠在民间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温馨的社会大环境,蹴鞠又以其趣味性、对

抗性、激烈性、动作花式多样在民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至清朝,统治阶级(顺治、乾隆等统治者)认为蹴鞠是一种放荡娱乐行为,为了巩固军队实力,对其采取禁止政策,而且将禁鞠政策从军队扩大到民间^[4]。从此蹴鞠慢慢走向衰败消亡的道路。

不难看出,蹴鞠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按照其社会功能的两条线为脉络,一是作为军事训练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二是作为民间娱乐项目在民间广泛开展。在冷兵器时代,蹴鞠作为军队训练内容,借用“蹴鞠”运动的形式,提高士兵的身体运动能力和军队的团结凝聚力,避免过多纯体能训练的枯燥无味。所以军事训练中的蹴鞠仅仅是士兵训练的一种方法手段,一旦社会和平、战事减少、蹴鞠作为相应的训练手段也会减少。再者军队的封闭性和士兵数量有限,加上军队纪律性,也不利于蹴鞠长久发展下去,只是作为训练内容保存。蹴鞠的长久发展离不开民间,民间开展蹴鞠源于其娱乐性。在我国,统治阶级推崇孔孟之道,弱化普通民众的欲望,控制其行为,把其牢牢地束缚在正统规范“礼”的范围内,宋朝的文弱之风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经济、政治、社会高度发达的时期,一味提倡“文弱达士”,弱化国民体力。后来的金兵南下,宋朝军队无力反抗,就不足为奇。封建朝代所产生的体育项目,无不例外,第一功能就是强身健体,必须符合“修身养性”,矛盾的纠结之处在于,在创造运动项目时所遵循的是要在尽量少的肢体动作上,尽量少的直接对抗上甚至不对抗的状态下达到锻炼身体目的(比如被各个达官贵人推崇的“炼丹”“长生不老术”)。所以蹴鞠在民间开展,存在天生的硬伤。

现实的蹴鞠比赛中“礼”比“规则”重要,“礼尚往来”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准则,即使是严肃的比赛,参赛者的直接目的不是赢取对手,而是在尽可能大团圆的欢喜氛围中(0比0打平)结束比赛,蹴鞠比赛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游戏,参与者注重的是参与过程的体验而弱化最后的比赛结果(恰恰这一点是当下体育过度竞技化继续发展的方向)。胡小明老师的“古代无体育”,大概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的古代体育,直接叫“游戏”更加确切。再者,对于参与蹴鞠比赛的球员的身份也划分严格,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宫廷足球队的人员分三等:第一等称“球头”,第二等叫“次球头”,第三等为一般球员^[5]。且在比赛的过程中,无论是最少两人还是最多九人的比赛,球必须按照固定的顺序从一个队员传给另外一个队员,

即便是射门动作也规定有队长一人来完成^[6]。从蹴鞠比赛场上队员的身份划分、比赛完成方式上也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观念。从比赛的设定上体现出身份的不平等性,限制参与者的身份,扼杀参与者的兴趣,严重阻碍蹴鞠运动的推广和发展。

体育比赛相对于游戏最大的特点在于参与者与对手、与自己的竞争对抗,结果简单明了,输赢胜负分明。抱着“礼尚往来”的思想,不求战胜对手,只是希望把比赛作为一种礼仪性的社交,显然违背体育比赛的对抗性、刺激性特点,使比赛毫无悬念,例行公事,渐渐失去比赛活力,淡化了参与者参与比赛的兴趣。所以和我国古代其他传统体育项目一样,蹴鞠虽是运动项目但只停留在游戏的范畴内。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像奥运会那样的体育盛会。

4 足球与法治社会的不谋而合

当下的足球为世界第一运动,吸引世界数以万计的人参与。人类的文明史不得不说西方的“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尤其是前者,更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主流文化。土地贫瘠、物质资源贫乏,面对艰苦的生存条件,西方先民面对大自然,与自然抗衡,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历史文化发展的积淀,西方国家在面对大自然时,与东方国家表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形式。农耕文化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崇拜甚至恐惧,比如上至皇家下至百姓都会举办形式多样,规模不一祭祀神灵的活动,祈求上帝的保佑就是最好的例子;西方则是在和大自然每时每刻进行对抗斗争,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求生存、求发展。

竞争对抗一方面是人与大自然,另一方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区别于中国的社会秩序稳定需要“礼”所衍生的“伦理纲常”来维持,西方社会则需要靠契约合作来维持社会稳定。原因有三,第一,人与自然对抗取得胜利推动社会文明向前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例如希腊,国土面积狭小,且多为群岛,人均资源有限,人与人之间为了获得生存发展的竞争对抗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社会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有良好的社会稳定环境作为支撑。第二,在和大自然对抗的过程中,人类作为整体,在和大自然对抗中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是社会成员之间互利共赢主动参与的,目的就是自己所需生存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强者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弱者则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成员之

间的竞争、对抗,势必会表现出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弱者为了生存表达自己诉求,强者有责任维持社会的稳定,两者共同努力制定社会契约,维持日常社会稳定,这就是后来的“法”。

“法”是整个社会各个成员的诉求,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准则。体育比赛的第一原则,就是参与者的公平、平等,比赛规则就如“法”,是每一个参与者所遵守的基本准则。不难发现,体育比赛只可能在“法”的社会土壤中产生。像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运动比赛的规则必须服从于社会的伦理纲常,且比赛的目的性比较隐晦,服务于其他社会事实而存在。现代足球产生于英国,比如在19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不同公学的学生,开始用足球俱乐部委员会会决机制,制定可以共同使用的比赛规则,可见,这已经反映出了政治社会生活中立法程序的影子^[6]。所以足球在西方“契约”“合作”“法”的社会大环境中,历经百余年的时间发展成世界第一大运动。而我们的蹴鞠运动,在温润“礼”的笼子里,断断续续两千余年最后走向消亡。

同时,足球运动更加符合西方人的民族特性。一,足球天生富有对抗性,比赛双方场上22名球员争抢一个球(现代足球刚开始时参与人数更多,可以是村与村、城与城所有人之间);二,足球比赛的场地宽阔,就目前世界主流体育项目中少有项目的场地能和它相比(不乏也有高尔夫、F1、赛马、赛艇等需要更大场地的项目,唯橄榄球可以看做是足球的一种形式),这也恰恰和西方人在浩瀚的大海与自然竞争谋求生存相得益彰;三,参与比赛目的直接明确,包括足球在内的体育比赛,参与者的唯一参赛目的就是击败所有参与者,拿到冠军,这恰恰是竞技体育比赛的魅力。我国蹴鞠作为一种游戏,强调修身养性,淡化比赛结果,这正是其慢慢失去运动活力直到最后消亡的原因之一。

足球和体育赛事的产生必须根植于“法”的社会。近代足球产生于英国,我国古代蹴鞠在近代却慢

慢的消亡。不同文化对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的影响,值得我们去深思。

5 结论

无论是我国古代的蹴鞠还是现代足球,作为一种运动项目,其产生、发展、消亡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土壤的影响。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明发展有着天壤之别,劳动人民在自己固有的自然条件下慢慢形成自己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蹴鞠和足球作为生活所衍生出的一种活动,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礼治”社会下的伦理纲常,森严等级制度,正统的儒道思想弱化参与蹴鞠比赛的目的性,过度追求比赛过程的愉悦性等因素,最终使蹴鞠运动走向消亡,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足球运动。相反西方社会所特有的民族对抗特性,社会的契约合作的“法治”关系,民主自由的公正平等思想,恰恰符合足球的项目特点,所以一旦产生,便能迅速地发展,直到今日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运动。

参考文献

- [1] 百度百科. 礼治[EB/OL]. (2015-06-20)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KcbCy2Ig2ksxxl9pgXj5zgxKVmo9TSEgTZQRfp9o4Npy_8d3W09Bp8s_7_QQGQPQ0VG-JQVYMQESkca-KJtltK.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7.
- [3] 李力研. 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M].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 [4] 张俊,孙开宏. 明清时期禁蹴鞠令对中国现代足球发展的影响[J]. 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5,31(3):37-39.
- [5] 崔乐泉. 中国古代蹴鞠[J]. 管子学刊,2004(3):43-51.
- [6] 黄金葵,吴升义. 中国古代蹴鞠衰落与英国现代足球兴起之深层审视[J].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25(4):320-324.

[责任编辑 江国平]